

第3典 民族文化
第4典 制度文化
第5典 教化与礼仪

第7典 科学技术
第8典 文艺

第9典 宗教与民俗
第10典 中外文化交流
第1典 历代文化沿革
第2典 地域文化

中华文化
通志

第6典

【学术】

军事学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庆
皮明勇 撰

中华文化
通志

第

6 典

【学术】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军事学志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萧 克

编	委	李学勤	宁 可	王 尧	刘泽华
		孙长江	庞 朴	陈美东	刘梦溪
		汤一介	姜义华	陈 昕	朱金元
		张国琦			

办公室主任 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 王科元

策 划 姜义华 张国琦

军事学志

作者简介

刘庆,1956年生。历史学硕士,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副研究员。合著有《白话兵法大观》、《宋辽夏金军事史》;主编有《外国重要军事著作导读》、《孙子兵法——中国智慧之海》。发表论文数十篇。

皮明勇,1960年生。历史学硕士,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副研究员。著有《左宗棠》、《中国近代史记·军事志》、《中国文明史·清代后期卷》(合著)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总 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宕；哺育着差不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和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通典》的这一编纂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纂关系到发掘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纂者不能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俾著者、读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骊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1991年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1992年组成编纂委员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1993年1月和1994年2月,全体作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中国军事学从上古至 1949 年间先后经历了古代军事学的形成和发展、古代军事学向近代军事学的转变、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出现了古代军事学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两个军事理论体系,在世界军事学史上具有公认的重要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本书即以此为对象,系统论述中国军事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介绍历代军事理论家和军事著作的概况,并分门别类地从战争观、国防思想、军队建设思想、战略战术等几个方面阐述其理论内容和发展轨迹,使读者能对这一领域的有关知识有较为清晰详尽的了解。

目 录

第一章 导 言	1
第一节 军事学的产生及发展.....	2
第二节 军事理论家群体及流派	18
第三节 军事学的主要载体——军事著作	32
第二章 战争观	41
第一节 “恭行天罚”与“神力天佑”	41
第二节 “义兵”和“国之大事”	48
第三节 军国主义及其他	67
第四节 中国无产阶级战争观	73
第三章 国防思想	84
第一节 国防观念的起源及历史变迁	84
第二节 国防建设思想.....	104
第三节 国防教育思想.....	125
第四章 军队建设思想	134
第一节 军队统御思想.....	135

第二节	武装力量体制和军队编制思想·····	150
第三节	兵役思想·····	164
第四节	部队教育训练思想·····	179
第五节	军队管理思想·····	201
第六节	军事后勤思想·····	217
第五章	战略思想·····	231
第一节	《孙子兵法》与中国古代战略理论的形成·····	231
第二节	中国古代各种战略理论形态·····	235
第三节	急剧转型的近代战略思想·····	239
第四节	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	254
第六章	战术思想·····	258
第一节	阵法与古代战术·····	258
第二节	近代西方战术思想的传入与古代战术的演变·····	273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战术·····	290
参考文献 ·····		294

第一章 导 言

军事学,在中国古代亦称兵学。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国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们对战争、军队等一系列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它是中国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并随着社会的前进、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逐渐深化,反过来又对各时期的军事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对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军事学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其思想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其后历代都有丰富和发展。它所提倡的重道慎战、义兵必胜的战争观,富国强兵的国防思想,知彼知己、示形动敌、兵贵神速、灵活应变的战争指导思想,以治为胜、上下同欲、恩威并施、气艺并重的治军思想,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后勤思想,寓兵于民的兵役思想等,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现代历史上影响极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充分吸收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创立了军事辩证法、人民战争理论和人民军队理论,总结了一系列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充分揭示了军事领域里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斗争的特殊规律,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也具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

第一节 军事学的产生及发展

中国军事学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上,大体经历了古代军事学初步形成、丰富发展、系统完善,西方军事学的传入与古代军事学的改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这样几个大的阶段。

一、上古至秦汉: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初步形成

一般认为,文明史意义上的战争,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但作为人类对战争和军队基本问题理性认识的军事学,却不是随着战争的问世而同步产生的。在战争产生后的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们的军事思维仍普遍处于蒙昧状态,大量愚昧落后的非理性意识,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战争的胜败,勇士的生死,都被视作由冥冥之中的“天意”、“神旨”所决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国家的兴起,军队成为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战争规模日渐扩大,金属兵器被普遍采用,军队结构日趋复杂,同时各种科学文化知识的积累,思维能力的进步,使人们对战争和军事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理性阶段。军事学即由此产生并获得初步发展。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中国早在黄帝与炎帝作战时,已经在有意识地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最后三战而得其志。而且“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史记·太史公自序》)。将军事谋略思想,甚至指挥用兵作战的“司马之法”与三皇五帝联系起来,恐怕过于武断。但华夏先民们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在商周时期由感性向理性概括的层面升华,则是不争的事实。从商代甲骨文材料中,我们可以看

到许多商与诸方国间追击、袭扰、用间的事例。周灭商之战，“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史记·齐太公世家》）。特别是在周朝建立以后，设置了处理日常军事行政事务的武官，“将有军旅会同田役之戒则受法于司马，以作其众庶”（《周礼·县师》），司兵“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周礼·司兵》），对军旅之事的零星记载显然已被较为系统的理论阐述（即司马之法）所代替。

周王朝采取的是“封建亲戚，以屏宗周”的政治统治方式，各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周天子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宗族、姻亲关系，这就将你死我活的政治利害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这一政治格局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西周古典礼乐文明，也不可避免地限制并扭曲了反映军事活动本质规律的军事学的正常发展，使其呈现出“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汉书·艺文志》）的鲜明特点。从保存着大量周朝司马法内容的今本《司马法》及《春秋》诸传中，不难发现“征伐以讨其不义”的战争宗旨，“不加丧，不因凶”、“成列而鼓”、“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的军事行动原则，哀伤怜病，服而舍之的战争善后措施。在西周至春秋前期，这些原则曾作为官方的军事学说普遍受到中原诸侯之国的遵奉。齐桓公时，管仲曾“作内政而寄军令”，对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进行改革，但他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周朝司马法和古军礼，而是运用其法，“变而为节制之兵，遂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刘寅：《司马法直解》）。春秋中后期，西周礼乐文明渐成土崩瓦解之势，要求抛弃迂腐古军礼，废除陈旧的司马法作战原则的呼声越来越高。时人舅犯言：“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子鱼也说：“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上述言论皆立足于功利学说，对以仁礼思想为核心的周朝司马法的权威性和可行性提出挑战。

而在实战中,采取于礼不合的奇袭、设伏、截击以及连续追击等新式战法的更是大有人在。至此,周朝司马法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诸子论兵和兵学流派的发展才成为可能。

春秋战国时期,一大批原先社会地位较低的文士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凭藉自己所掌握的文化知识,聚徒讲学,议论政治,游说诸侯,著书立说,在当时的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军事领域,诸子百家也对战争性质和作用等重大问题表明了各自的看法。法家拥护战争,重视耕战,提倡以战争手段实现统一;儒家倡导义战,反对杀人盈城盈野的兼并战争,认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公孙丑》);墨家主张兼爱非攻,提倡严密城守,把战争区分为“诛”(诛无道)与“攻”(攻无罪)两类,认为前者是正义战争,后者是“兼恶天下之百姓”(《墨子·非攻下》)的非正义战争;道家认为兵凶战危,“兵者为不祥之器”,诅咒战争,但为了反对弱肉强食,也赞成哀兵必胜的道理;纵横家对战争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们主张用战争“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战国策·秦一》),并在战国时期的战争舞台上,运用这一理论导演出一幕幕合纵连横的壮举。

对中国古代军事学的盛兴发展及其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最重要贡献的还是兵家学派。他们在战争问题上,提出了重战慎战思想,看到了政治对战争的决定性作用,以朴素的语言谈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更重视建军治军、作战指导等问题的阐述,在继承商周以来军事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全新的军事理论体系,其标志便是《孙子兵法》的问世。^①

《孙子兵法》是在批判以往军事学传统,特别是周朝司马法的基础上立论的。它驳斥了愚昧落后的远古时代所形成的占卜迷信思想,

^① 《孙子兵法》的作成时间,学术界意见不一致。本书认为,其主要思想当源于春秋末年兵学家孙武,经孙氏后学多次整理、加工、修改而成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

指出在军事决策和情报搜集方面,“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孙子兵法·用间篇》),而要依靠人的努力。它摒弃了以仁义礼让为核心的周朝司马法,认为现在的战争不再是为了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和古老的礼乐文明,而是为了诸侯国君自身的利益。在作战方法上,它基本上不赞成堂堂之阵、正正之兵,单靠勇力取胜的做法,而是提倡“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计篇》)。在对待敌人的政策上,也冲破了西周以来所盛行的“服而舍人”的原则,提倡“因粮于敌”,“掠于饶野”,缴获敌人战车后要“杂而乘之”,靠敌人的装备来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上述重要观念的突破为前提,以国家、君主的根本利益为理论建设的出发点,以战争制胜为核心,《孙子兵法》围绕着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这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进行具体理论阐述,提出了重战慎战的思想;注重计谋的思想、全胜思想和进攻速胜思想,概括总结了奇正原则、主动原则、机动原则、特殊地形的利害判断原则以及火攻、用间等特殊战法。它还沿用了前人提出的饥饱、劳逸、先后、众寡、主客诸范畴,并将阴阳、奇正等其他领域的范畴予以改造和借用,还根据理论阐述的需要构建了分数、勇怯、治乱等大量的新范畴,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军事学范畴体系。它善于运用五行相胜、阴阳相克的朴素辩证思维、整体思维、定量分析方法、逻辑推演方法来阐明用兵之道,语义深刻,警句迭出,富于思想启迪性,对其后历朝历代军事学的发展都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由《孙子兵法》所确立的军事学理论框架被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比如《六韬》关于军队组织编制、将领选拔和步骑配合作战的专论,《孙臧兵法》对城垒攻防的论述,《墨子》完善环城防御体系、防御与出击有机结合的城守思想,《管子》对国防费用和武器装备管理方面的研究,都弥补了《孙子兵法》在理论体系上的缺陷。《孙臧兵法》关于“道”的阐释,《六韬》、《管子》对全胜思想的解说,远比《孙子

兵法》更为深刻和全面。战国晚期,一些人开始有意识地吸收他人军事学理论精华,综合儒、道、法、墨等各派兵论的长处,表现出强烈的兼收并蓄倾向,像《六韬》、《尉繚子》皆有集前人理论观点之大成的特点。真正全面总结、归纳和整理先秦军事学成果,还是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汉朝建立之后。汉代曾三次由官府出面搜集、整理兵书,历次整理兵书的负责人张良、韩信、杨仆、任宏皆为深通兵法的最佳人选。许多先秦兵学著述的篇目分合、文字润色、理论补充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汉代四百年间,留下来的兵书只有《黄石公三略》等寥寥几部,以及《淮南子》、《盐铁论》、《潜夫论》等典籍中的个别论兵篇章,但其在整理、总结先秦军事学方面的巨大贡献则是无可置疑的。

二、三国至宋元:中国古代军事学的丰富发展

三国至隋唐的数百年间,兵学家们对《孙子兵法》所确立的中国古代军事学体系进一步加以完善和补充。

他们面临新的更为复杂的军事斗争环境,根据实践经验,对现实战略与长远战略的关系、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以及联盟战略、统一战略的基本原则,都有了更加深刻、系统的认识。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诸葛亮的战略分析名篇《隆中对》,全面分析了当时多集团、多极斗争的形势,本着伐谋伐交,强己弱敌的联盟战略原则,提出了建立根基,外结盟国,内修政理,伺机而进的建策。五代十国时期,宋太祖赵匡胤为了统一全国,也制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主张“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故存之以为我屏蔽,俟我富实则取之”(《东都事略》卷二三)。这期间,还出现了中国第一部专门讨论战争全局性、谋略性问题的专著——《战略》(晋初